

文化产业和市场发展路径的省思

——写给 2014

文化产业与市场编辑部

回顾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状况,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事件和人物,包括电影票房超过210亿元这样的数字。其中,话剧《蒋公的面子》的上演和年底艺术品拍卖市场爆出的新闻——上海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下的苏軾《功甫帖》被专家质疑,对我们省思这一年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路径,颇具价值。

就《蒋公的面子》而言,投入不足5万元、“90后”的编剧,“80后”的表演团队、“50后”的导演、全国巡演20个城市,并在美国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演出10场,总演出场次超过130场,票房流水近千万元。这一串数字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原创作品极为稀缺的背景下,如何解放思想,让“思想市场”不断绽放出创新的花蕊;如何认识市场,在市场经济规律下不断催生富有票房号召力的作品。要知道,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就没有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有关《功甫帖》的争议则再一次反映出,艺术品市场的监管缺失、交易秩序混乱、产业结构不合理、行业诚信缺失等痼疾,以及艺术品鉴定人身份的认证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市场失灵的窘况,迫切需要权威性的法规和政策的加以规范。可喜的是,2013年文化部已经推出了艺术品鉴定试点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2014年艺术品市场将有新的改观,其隐于冰山之下的产业价值也应该登上中国文化产业的价值榜,让人一睹芳容。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的制度红利

跨过上述两个样本,对2013年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进行概括描述会发现,在中共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工作的深化,某些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或放宽。其中,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级文化部门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为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年终的相关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文化产业不同门类有升有降的状况也进一步表明,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许多基础性的因素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概言之就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做强做大文化市场主体,发展意愿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业界人士对文化产业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推出,使原有的由政府出资举办大型会展及舞台制作奢侈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八项规定”的传导效应或许还在更深的层面上,为整个文化产业方式敲响了警钟——文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该清晰。

令人欣喜和振奋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这一基点,就加快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战略部署。因此,2014年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起始之年,其价值和意义应与19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1年的加入世贸组织一样巨大、深远。从这样的历史逻辑来看,《决定》不仅为今后的整个文化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下一阶段文化改革与发展抹上了浓重的底色,更为今后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路标。

这个路标告诉我们:面对2014年和今后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仍然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即2013年初我们所刊发的《体认文化产业的新思维、新空间、新支点——写给2013》一文中所强调的:“在文化产业总量增长的背后,散、弱、小、差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市场缺乏有效供给的产品结构和文化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状况没有改变;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边界尚未厘清的体制环境下,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而这些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恰恰需要政府和企业对《决定》的学习和贯彻落实。

《决定》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原来的“基础性”到“决定性”,三字之差,涵义深远,充分彰显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的决心,因此,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大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历史上,或是经济学理论发展本身,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要更多地从供给层面去管理中国经济,其说法和观点也许能给文化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带来一些启发。

在以往,宏观经济政策更多着眼于从需求的角度来思考,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所谓刚性消费需求,还是对房地产的投资或投机需求,都难以得到遏制,总需求管理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无效的。因此,应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根据“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多从供给层面关注和管理宏观经济。

对此,经济学家滕泰撰文提出了“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观点。他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从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达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状态。

无论“供给约束”还是“供给抑制”,在今天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简政放权、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将是今后推动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繁荣的首要问题。

同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认为,应根据区位优势的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聚集程度的不同,从空间结构优化入手,建立起符合我国东、中、西差异化发展现实的文化产业空间布局,也就是说,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围绕“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规划和构建能够充分体现“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新型文化产业空间布局,这也是矫正和改变目前某些文化产业领域同质化、盲目化倾向的一个必要的约束性条件。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好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是2014年和今后一个阶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目标的降低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所形成的对冲关系,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支撑点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经济增长的目标由原来的“保八”正逐步调低为7.5%或7%,虽然只有0.5%的差距,但进一步体现了政府在结构转型方面的决心。实际上,在2013年年中,媒体和学界有关“李克强经济学”的提法,已为今后一个时期结构调整、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提供了注解。

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对于2014年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来说,同样是一个不能忽视并且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7%或7.5%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可能为下一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投资等方面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经济基本面的发展与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整个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文化产业同样会遇到危机。以往所谓的文化产业的“口红效应”是一个美丽而错误的想象。

当然,7%或7.5%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是中央政府为了可持续发展与均衡发展的主动作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并因此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强调,恰好与经济增长目标调低构成一种对冲关系,甚至可以说,新型城镇化战略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均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提供的是新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机遇。

一句“记得住乡愁”的诗意表达,反映的是民众的企盼,表达的是对过往土地拆迁行为的一种否定,更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古镇和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思考和发展的空间。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既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实际上,城镇化战略提出的基本诉求又与目前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阶段极为契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支撑点和着力点。且不说二、三线城市,即便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各项基础设施条件还很差,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文化产业来说都是机遇。

2014:文化产业基地与园区的2.0时代

在2012年中国社科院《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报告(2012—2013)》总报告中,曾根据文化产业增速放缓的情况,分析了文化市场“从短缺走向短缺与过剩并存”等四大趋势,之后提出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拐点,即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在从政府主导的启动阶段走向依靠市场内生动力发展的新阶段。

一年多来的文化产业实践表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作为拐点阶段的突出特征,虽然在宏观上状况依然如故,但在微观层面已有突破的端倪。比如,在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领域,政府和企业都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体验式文化商业”的观点,一些企业孵化型的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开始向以产业链为支撑的模式过渡,一些门店聚集型园区进一步强化旅游要素的植入……总之,相当数量的基地和园区开始呈现出复合型、跨界化的经营形态,为基地和园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标志着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园区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产业园区的2.0时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和讳言,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的空心化、泡沫化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某些二、三线城市出现的“鬼城”也是拜某些文化产业项目所赐。因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二、三线城市必须警惕有些人或企业借文化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最终导致文化产业园区的烂尾化。

我们相信,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贯彻落实,2014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3年度阅读

《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报告(2012—2013)》

张晓明 王家新 章建刚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月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文化产业新的发展周期,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拐点,文化市场已经从总体“短缺”转向“短缺”与“过剩”并存,文化产业正在从“分业发展”走向融合发展,从区域性竞争发展走向统一市场条件下的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也随着本轮改革结束而逐渐衰减。本书建议针对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以深化改革启动新的“制度红利期”;适应融合发展的新需要而合并原有分业管理的部门,尽快组建综合文化管理机构。

《文化产业的创新体系和效率评价研究》

周锦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产业创新是经济动力的来源,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产业创新离不开内外动力共存的创新机制,需要合理的产业创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本书深层剖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通过对文化产业创新机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对我国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等进行了动态评价,并对我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电影编剧的秘密》

芦苇 王天兵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本书收入芦苇和王天兵的四次谈话,将芦苇的成长经历与电影编剧技巧的讲解融为一体,既有普通的编剧法则又有实战教训,还有芦苇对自己职业生涯重要作品的技巧分析,包括《秦颂》、《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谈话内容实在具体,又有可操作性,可以当成一部编剧教程。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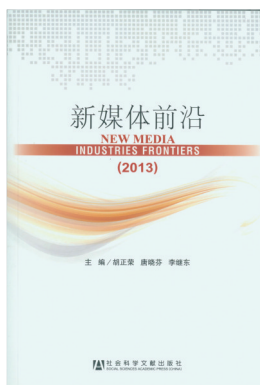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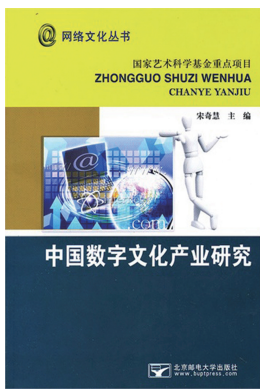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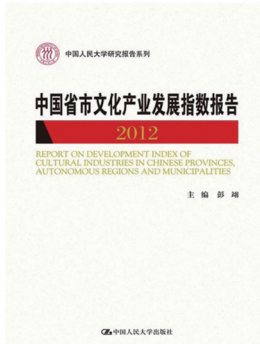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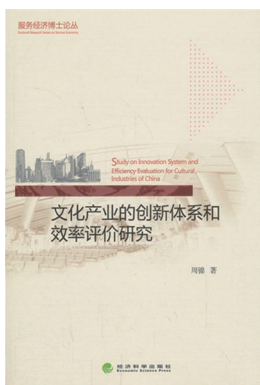
彭翔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逐步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为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反映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同时使地方政府能够发现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与短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本书从生产力、影响力、驱动力的角度,阐述了2011年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研究》

宋奇慧 主编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6月
全书主要探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和主要对策。本书共分十章:前三章是对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总体介绍,着重分析其趋势,开展对策研究;从第四章到第九章,分别对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字音乐、网络视频、无线娱乐以及网络文学、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其他数字文化产业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一章介绍了国外主要国家的数字文化产业及其政策的相关情况。

《新媒体前沿(2013)》

胡正荣 唐晓芬 李继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本书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如传统媒体的转型路在何方,欧美报业的“付费墙”策略和兰登书屋的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代表纸媒的出路等。此外,本书还针对新技术新媒体给各国政府带来的不同层次的机遇和挑战展开讨论:在政府治理层面,如何使用大数据打造透明、智慧和负责任的政府,将数据治国和数据强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产业监管层面,各国政府又是如何应对数字出版产业中共同面临的盗版和侵权问题。



向全国读者和文化产业工作者恭贺新年!